

譚仲池 主編

长沙通史 古代卷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庫

湖湘

谭仲池 主编

长沙通史

古代卷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杜家毫	陈求发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郭开朗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许又声			
副组长	李有志	王汀明			
成 员	钟万民	姜儒振	史耀斌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周用金	•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长沙通史》编委会

顾问	陈润儿	张剑飞		
编委会主任	谭仲池			
副主任	谢建辉	张迎龙	陈泽琿	
	周秋光	熊治祁	蒋集政	
编委	芮英姿	毛求	曾秉炎	罗文章
	杨建国	李育民	李峻	梁小进
	曹凜	何旭红	王立华	彭富庚
	彭平一	薛其林	杨建宏	
编务	唐曙光	李守红	周国华	黄熊飞
	王启贤			

《长沙通史·古代卷》

执行主编	杨建宏			
作者	胡友慧	唐德荣	廖良梅	张颖华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谭仲池

“盛世修史”是我国文化承传的历史传统。《长沙通史》是《湖湘文库》已编的湖湘历史中最有分量和最具地域特色的一部史书，也是《湖湘文库》中唯一的一部城市通史。

长沙是一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城，是国务院 1982 年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她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悠久的历史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长沙位于东经 $111^{\circ}54'$ — $114^{\circ}15'$ ，北纬 $27^{\circ}51'$ — $28^{\circ}41'$ ，地处湘中丘陵与洞庭冲积平原过渡地带的长浏盆地。湘江自南而北贯穿全境，境内汇入湘江的支流有 15 条。主要有浏阳河、捞刀河、靳江和洩水。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暖。全年无霜期约 275 天，年平均气温 $16.8-17.2^{\circ}\text{C}$ ，年平均总降水量 1422.4 毫米。水资源以地表水为主，水源充足，年均地表径流量达 808 亿立方米。远古时期，湘江两岸的河谷平原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这里的动植物品种繁多，十分丰富。正是这种优厚的地理条件为远古长沙先民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丰沃土地和阳光雨露。

在大约距今 15—2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浏盆地的湘江两

岸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居民聚落开始在湘江两岸的河谷渐次产生，从而形成了长沙最初的雏形。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长沙之名，起于洪荒之世。”不过，真正可靠的文字记载是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中。该书记载，西周成王七年（公元前1050年），成王大会诸侯于雒，并接受各方诸侯贡献的方物，其中就有“长沙鳖”。这应该是目前查找到的“长沙”地名的最早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扬越之地”的长沙为楚国黔中郡辖地。秦代首建洞庭郡，以湘县（在今长沙城区）为治所。汉代改立长沙国，改湘县为临湘县，作为国都。两晋南北朝设湘州，仍以临湘为治所。隋唐宋元设潭州，改临湘为长沙，为潭州治所。明清设长沙府，并从长沙县析出善化县，长、善两县治所同城，同时也是长沙府治所。清康熙三年（1664年），湖南正式建省，长沙成为湖南省省会。此后，一直到民国，长沙都是省、府（道）、县（市）的三级机构的治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长沙市、县分治。设立长沙市为湖南省会，直至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乃至如今。

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演进中，长沙的历史地位和地域影响不断提升扩展。一方面，自秦以来，不论其名称和行政区划怎么变化，长沙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这种中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得到加强，最终成为湖南省的省会。另一方面，长沙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提升。战国时期，长沙已经是楚国镇守南方的军事重镇和重要粮仓。秦汉到唐宋，湖南虽然还是中原王朝流放和安置贬谪官员和失势权贵之处，但在军事上，长沙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长沙地区征战频繁，长沙的许多地名都与历史上的武将征战的传说相关。如铜官、靖港、捞刀河、营盘街、蚂蚁（马援）巷等。随着历史的发展，长沙的经济

愈益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的逐渐开发，长沙开始成为历代王朝重要的财赋来源地和转运中心。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的南移，潭州州城长沙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湘江沿岸的望城铜官一带，依托长沙窑的手工业，亦发展成为瓷器外销海外的商贸中心。宋元时期，潭州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明清时期，长沙形成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茶市和米市，同时也是全国著名的陶都。与此同时，长沙的文化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南宋以降，长沙的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之地，有“潇湘洙泗”、“荆蛮邹鲁”的美誉。明清时期，湖湘文化再度复兴，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神圣殿堂，走出了一大批闻名全国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到清嘉道年间，湖南经世学派兴起，长沙亦是湖南经世学派的集散之地。进入近代，长沙的政治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从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湘军的兴起，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从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宪政运动的重要阵地，到辛亥长沙响应武昌的起义；从军阀混战时期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从抗日战争的四次长沙会战，到 1949 年湖南的和平解放，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充分体现了长沙人的智勇担当、宏远抱负和爱国图强的赤子情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长沙在不断积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长沙县南托大塘遗址，发掘的距今 7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残片上我们看到，那些在太阳照耀下的高冠长尾鸟，就极生动地折射出长沙先民原始的审美意识和奇特的想象力。长沙腰塘和团山里考古遗址发现的距今 5000 多年的陶器属于屈家岭文化的范畴，浏阳樟树潭考古遗址发现的距今 4500 年的陶器则属于龙山文化的范畴。所有这些，无不具有“三苗”文化的鲜明特征。宁乡

炭河里与长沙杨家山等地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大量石器、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既具有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内蕴，又有明显的古越文化的特征，极其生动地显现了中原文化与湘楚文化融合的趋势。而长沙地区发现的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如商代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和乐器大铜铙等，都更深邃地展示了当时长沙青铜文化融合南北的特质创造的独特文化价值。长沙马王堆汉墓，以及在长沙发掘的西汉长沙国王陵，出土的大量文物，又为我们了解当时长沙的文化状貌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进入21世纪之初，在长沙五一广场附近的古井中发现的大量西汉、东汉和孙吴时期的简牍，再为我们了解从西汉到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信息。唐代铜官窑遗址则向世人展示了从唐到五代长沙釉下多彩陶瓷工艺的古典辉煌。最近，在长沙市南部区域多处建筑工地发现古迹与古墓，初步判定时间跨度从魏晋、宋直至明清时期。这些文物遗迹均揭示出宋代、明代和清代等朝代长沙城的城市基本格局和文化走向。

长沙是众多历史文化名人荟萃的地方。屈原和贾谊在长沙地域留下了许多抒发崇高信念和燃烧炽热激情的辞赋。到了唐代，一些贬谪、流放长沙的失意官员和文人虽然怨卧江城，却以其真诚与血性写下了千古流传的雄奇诗章和人生风雅。还有更多的诗人则留下了对长沙自然景致和风土人情的深情眷恋和美好赞誉。诗圣杜甫初到长沙乔口，曾有“凄惻近长沙”的抱怨，可当他真正走进长沙，便生“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兴叹。南宋时期，福建人胡安国和胡宏父子在潭州的隐山建碧泉书院、在宁乡建灵峰书院，从而创立了湖湘学派。此后，胡宏弟子张栻主讲长沙岳麓书院，并与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留下了“朱张会讲”的传世佳话。明代时，著名的心学创始人王守仁也曾

讲学岳麓书院，其弟子季本、罗洪先、张元忭也先后讲学于长沙，使湖湘文化增添了新的学术霞晖。

不过，直到唐朝，长沙本土的文化名人并不多。潭州书法家欧阳询算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本土文人。长沙人刘蜕于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 805 年）考上进士，被称为“破天荒”。宋以后，湖湘学派创立，湖南本土文化名人逐渐增多，长沙才成为湖南本土文化名人集中的地方。此时，长沙的不凡人才有如森林于大山，郁郁葱葱、伟岸撑天。如宋代的易祓、元代的欧阳玄、明代的李东阳、明末清初的陶汝鼎、王夫之，清代的李文炤、王文清、罗典等。进入近代，湖南形成了五大人才群体，即以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为代表的湖南经世派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群体；以黄兴、宋教仁、秦力山、杨毓麟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以杨昌济为精神领袖，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为代表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才大都籍属长沙（或长沙府属各县）。他们中有的在长沙读书，有的在长沙从事政治、军事和教育等活动，并从长沙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因此，长沙是这五大人才群体的成长摇篮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出发地。“五四运动”后，长沙更是人才辈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群体在“五四运动”后发生分化，其最杰出的精英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中，长沙地区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柳直荀、杨开慧、刘少奇、徐特立、谢觉哉、李维汉、李富春等。除此之外，长沙近现代还涌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文化名人。如以丁取忠为代表的长沙数学学派、戏曲名

家杨恩寿、经学大师王闿运、文字版本学家叶德辉、史学大家王先谦和教育家刘人熙、张百熙。著名教育家易培基和朱剑凡、著名土木工程专家周凤九、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著名作家田汉、著名哲学家金岳霖、著名医学家张孝骞等。正如岳麓书院门前对联所称：“惟楚有材，于斯为甚。”

长沙是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长沙在近现代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运动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长沙走出去的湘军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都英勇抵抗，浴血奋战；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份，而长沙则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心；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湖南立宪派人士在长沙积极推动宪政，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辛亥革命中，长沙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在“五四运动”中，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人民“驱张运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等在长沙的建党活动，使长沙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地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农民运动闻名全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长沙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抗日战争初期，长沙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巨大，大批名校迁来长沙，大批文化名人聚集长沙，长沙成为了战时著名的“文化城”；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四次进犯长沙，中国军队在长沙组织了四次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首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方面胜利的纪录，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深远；在解放战争中，长沙人民积极开展和平民主运动，最后争取国民党长沙守军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这对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长沙人民明德致远，心忧天下，求是创新，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精神。

这次修撰《长沙通史》的实践，还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要把《通史》写好，关键的问题是修史者要以历史的眼光、海岳的胸怀、精到的思维，严肃而认真、准确而全面地把握所修历史的思想脉络、复杂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大历史因素，并将其客观、简约、具体地表述出来。这种悟觉和总揽又表现在《长沙通史》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界定、体例结构和编写原则等方面。

历史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沙的区域范围和行政建制一直有着很大的变化。秦朝开始在长沙设立直属中央的行政区域即洞庭郡（传统上称为长沙郡），其辖下有湘、罗、湘南、阴山、零陵、衡山、桂阳、益阳、耒等9县，其管辖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湘江流域及资水、沅水流域一部分。西汉初年建立长沙国，其辖区范围最大时有临湘、罗、益阳、连道、承阳、酃、昭陵、容陵、茶陵、湘南、攸、郴、营浦、南平、舂陵、冷道、安成、桂阳、观阳、洮阳等22个县，其管辖范围甚至超出了现代湖南省的范围。唐朝的潭州辖长沙、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湘潭6县。宋朝的潭州管辖范围扩大，到宋末时辖长沙、善化、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湘潭、醴陵、湘乡、安化、攸、衡山等12县。明朝设立长沙府，管辖长沙、善化、湘潭、湘阴、湘乡、宁乡、益阳、浏阳、安化、醴陵、攸县等11县和茶陵1散州，这种行政区划一起沿袭到民国初年。民国元年将长沙县和善化县合并，次年又撤府留县，设长沙县。1933年，中华民国政府从长沙县析出长沙市区，成立省辖市，作为省会城市，实行市、县分治，直到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1958

8 年，长沙市作为省辖市和省会城市，下面不辖县。而长沙县和望城县归当时的湘潭专区管辖。1959年，长沙县和望城县划归长沙市管辖，合并为长沙县。1977年又将长沙县分为长沙、望城两县，望城县改为望城区，归入市区。1983年2月，又将被撤销的湘潭地区的浏阳县（浏阳于1993年撤县设市）、益阳地区的宁乡县、岳阳地区的湘阴县划归长沙市管辖。同年，又将湘阴县重新划归恢复建制的岳阳地区。在历史沿革中，长沙及其下辖各县的管辖范围在不断地变化。而作为一部地方史，必须确定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这一地域范围既要反映历史的沿革，又要符合当代行政区域的实有状况。根据这一原则，《长沙通史》的各卷记事基本上以现在长沙市及所辖县（市）为范围，即包括长沙市区、长沙县、望城县（现已撤县建区，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宁乡县、浏阳市；同时，对历史上曾经是长沙行政区划管辖范围，但现在已经不再属于长沙行政区划内的地区发生的，且对长沙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也酌情记述。

从时间范围来说，《长沙通史》编撰原计划分三卷，即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上溯于距今20至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下断于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纳入《湖湘文库》出版。后来，根据长沙发展需要，以便存史备载，故新增编纂《长沙通史》当代卷计划，止于2007年。《湖湘文库》编纂委员会对此予以支持单列出版。

古代卷记述从距今20万年至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近20万年长沙的历史。其中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只能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古代典籍中记载的神话传说进行简略的记述。从夏商周开始，分章记述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所以，古代

卷记述的主要还是 3000 多年文明时代的长沙历史。

近代卷记述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共 80 年的长沙历史。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开始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开始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近代卷围绕中国社会性质演变对长沙社会的影响，以及长沙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现代卷记述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长沙和平解放共 30 年的历史。“五四运动”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这一时期，长沙经历了军阀割据和混战，见证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分裂，也遭受和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此同时，长沙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还在继续。这些都构成了现代卷的主要内容。

当代卷记述从 1949 年长沙和平解放后到 2007 年共 57 年的历史。新中国的长沙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长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科教文化繁荣壮大，城市宜居品质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不断增强。当代卷编撰至 2007 年，考虑到刚好是长沙市第十二届人民政府完成了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全市人民正以新的姿态，更昂扬的斗志，迎来政府换届，继续抒写新的历史发展篇章。

从整体上把握长沙历史演进过程是本书编写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长沙通史》筹划和编纂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勾勒长沙历史发展进程，这就是历史主线的问题。中国史学界曾对中国历史主线，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主线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赞同历史发展是一个非线性过程，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的观点。主

张“从抓主要线索为主的表层线性研究”转换为以整个“社会结构的运动为对象的立体研究”。因此，我们把长沙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要素构成的社会整体的有机发展过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实照应。在记述长沙历史时，注意从整体上来把握长沙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刻意去寻找一条或几条历史线索作为主线。特别注意长沙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如从魏晋以来，经隋唐，到宋朝，中国出现了一个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得到大规模开发的现象。这一现象本身就有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对于长沙的影响，也应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进行分析。而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长沙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形成。本书的古代卷正是从这一视角来记述这段历史。又如鸦片战争后长沙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化，也是多元因素促成的，如果不从整体上来认识这一过程，极易将丰富多彩的近代历史过程简单化。“五四运动”后的军阀混战、国共分合，以及长沙城市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都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形成互动关系。因此，必须从“五四运动”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的内在变化和互动联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and 趋势。

注重长沙城市的发展进程及其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趋势是本书编写的另一重要原则。《长沙通史》既是一部地方史，同时也是城市的发展史。作为地方史，当然不能只记载城市的历史。举凡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大事，不管是城市、墟集、农村，只要是发生在长沙地区，无疑都应该记载。然而长沙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作为区

域中心的城市，几千年来城市中心一直没有转移。长沙城的建立最早起于战国时期的楚国统治下。当时的城市中心位于今五一广场一带。随后的 2000 余年里，长沙城市一直以此为向四周扩展。近年来的长沙考古成果都反映了长沙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进入近代，长沙开始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长沙城市的发展和现代转型的过程集中反映了长沙地方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区域中心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并逐渐影响甚至支配整个地区经济。本书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展开对长沙城市发展进程以及现代化转型趋势的叙述。如古代卷关注长沙城市作为区域性经济政治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区域性都会的形成；近代卷关注长沙城市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的原因、过程影响，尤其是对长沙开埠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同时花较大的篇幅记叙了长沙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现代卷则较多地关注了长沙城市的现代市政管理和建设、现代城市生活、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代卷则更多地关注长沙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重视对民众一般生活状况的记述，也是本书的一个编写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重视对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的研究，相对来说，对社会普遍面（即普通民众生活）的研究则薄弱许多。其实，重视那些似乎与历史规律和必然性无关的社会一般生活、普通民众以及人们的一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任务所决定的，也是当代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地方史和城市史编写更应将关注重点下移，重视对社会普通民众生活状况的研究和记述。本书各卷编写过程中比较注重这一点。特别是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充分利用地方志书、个人日记、来往书信、报刊新闻等资料，对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行了